

“反东方主义”在中国的历史考察

陈东林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

加加美光行教授的论文，向我们提出了一个很有启发性的课题——克服现代中国学研究中的“东方主义”倾向，加强共同性研究。他是从日本当代中国学的历史回顾提出的，而我们中国学者作为当代中国学的本体，从中国历史进行考察，也是有意义的。

一、70年代以前毛泽东的“地域观念”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当代中国学实际上是和政治原则密切结合在一起的，也就是加加美教授所说的“国策性”。而毛泽东的“地域观念”，指导着中国国内的“国策研究”。

1946年毛泽东与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谈话，提出了“中间地带”的思想，将世界划分为美国、苏联和欧亚非资本主义及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三种。¹ 但国共战争爆发，毛泽东立即接受了苏联关于两大阵营的论断，排除了“中间地带”。

1949年，新中国宣布“一边倒”方针，和苏联社会主义阵营联合为一体。由于美国对中国实行军事包围封锁，美国的中国学研究是冷战时代的情报分析为主。50年代中国在政治形态上坚决反帝国主义，一切学习苏联，这实际上也是一种变态的东方主义或者东欧中心论。以此来反对西方国家的“东方主义”。

中苏关系破裂后，1964年毛泽东同日本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听涛克己谈话，再次提出修正了的“两个中间地带”：在美国和苏联社会主义阵营之间，亚非拉国家是第一中间地带，欧洲、北美、大洋洲国家和日本是第二中间地带。² 但这种观点很快就被文革中的“反帝必反修”极端战略淹没。

进入1970年代，世界上绝大多数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已经获得了独立，“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的高潮已经过去。如何用新的旗帜来号召和统率多数国家？毛泽东看到，由于美、苏争夺霸权，其他国家都或多或少地被卷入其中，受到经济制约、政治压迫，还有的直接被军事控制。根据程度不同，大致上可以分为两大类国家。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不再是不可跨越的鸿沟。他设计了个“一条线”、“一大片”和“三个世界”的地域概念。

1973年2月，毛泽东会见基辛格，提出“一条线”及“一大片”的构想，将从中国、日本经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欧洲到美国一条线及这条线周围一大片国家联合起来，共同反对苏联霸权主义。

¹ 《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页1193。

² 《毛泽东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页513—517。

1974年2月22日，毛泽东在北京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提出“三个世界”思想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是第三世界。”³ 1974年4月10日，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第6届特别会议上发言，第一次向全世界阐述了作为中国外交国策的“三个世界”思想。

但是，划分“三个世界”战略不仅与列宁的帝国主义时代特征格格不入，也放弃了60年代中共以“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划分敌人的意识形态标准。“三个世界”的具体划分也存在着模糊区。比如，无论从经济发展程度还是与美国的军事结盟关系，韩国、以色列都很难与北朝鲜、阿拉伯国家属于一类。

从1982年中共十二大开始，中国放弃了“三个世界”的外交国策，但“第三世界”的提法在很长时期内仍然作为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代名词。

二、中国“反东方主义”的提出与“国策性”研究

80年代以前，国内研究被毛泽东的观念绝对支配着，完全是国策研究或者宣传，属于官方领域，包括中央党校、外交部、总参、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等少数学术机构，也基本从事论证官方政策正确性的配合工作。

“九评”文章就是这样的产物，随着中苏大论战的进行，这种对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实际上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精神领袖的争夺战。在意识形态上，则是出现了“反东方主义”的极端倾向，即宣传中国是革命的中心，以对抗美苏的意识形态霸权地位。

1966年林彪正式提出：“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然后在1969年九大报告中提出“世界正在进入毛泽东时代”。以后，中国是世界革命的中心等说法成为热点。不仅亚非拉美的不发达国家到中国来学习革命理论，而且在西方国家也出现了以中国为“反东方主义”中心的潮流，如日本赤军、意大利红色旅、法国学生运动等都从这里寻找支持。

这种论断，与其说是真正相信中国成为世界革命中心，不如说是对抗“东方主义”而在意识形态上树立的“反东方主义”大旗。

所以，当中美缓和以后，1973年中共十大报告中，毛泽东修改了世界进入毛泽东时代的提法，还是提帝国主义时代，但是苏联被加上“社会帝国主义”而归为霸权主义一类。

针对苏联出现齐赫文斯基院士编写的反对中国共产党路线的《中国近代史》等，及苏联中国学研究的大本营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编写的一系列严重带有政治色彩的宣传品，中国在学术方面也进行“反东方主义”，起先是撰写《美国侵

³ 《毛泽东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页600。

华史》，后来是撰写《沙俄侵华史》。微妙的是由于当时联合日本的需要，对侵略中国最严重的日本，反而迟迟没有撰写出《日本侵华史》。“反东方主义”的国策性质，严重影响着客观性。

历史已经过去了几十年，但在当今中国国内，仍然可以找到“东方主义”、“反东方主义”两种形态的遗留，甚至可以说是复活。一种是以西方中国学研究为座右铭的新自由主义倾向，一种是复活中国中心论的极端民族主义思潮。而另一方面，在中国，脱离国策性的独立研究思考，在大学和科研机构中已经形成一定潮流，甚至出现了民间的中国问题研究者。

因此，无论在克服错误倾向方面，还是在加强共同性研究方面，加加美教授的论文，爱知大学国际中国学召开的多次研讨会，都提出了一个值得我们共同努力的方向，我对此给予高度评价。